

清代玺印满文篆字舛误研究

黄锡惠

(黑龙江大学 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乾隆十三年详备满文篆书三十二体, 并将其中十体应用于玺印谥宝, 形成中国历史上字体最多且最富民族特点的民族文篆字与汉文篆字合璧之玺印制度。满文篆字于清代合璧玺印中通用达 174 年之久, 从帝后玺宝到百官印信, 其中不乏生造、讹形、脱衍、错位、混体甚至缺文等失误, 乾隆时代即现端倪, 以降诸帝亦步其踪迹, 尤以光绪时为烈, 其末年竟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极个别的官印中满文篆字俨然形同虚设的装饰点缀, 完全丧失了传达信息的功能。

关键词: 清代玺印; 满文篆字; 舛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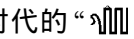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H 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873(2008) 02- 0041- 13

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富于创造性的民族, 在它的发展历史上不仅借鉴蒙古文字创制了自己民族文字的楷书、行书和草书, 而且还创制了篆书; 其不独创制了满文篆书一体, 而且又全面效仿汉文篆书三十二体, 对应创造了满文篆书三十二体, 从而将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篆字文化成果的实践推向极致, 蔚成我国民族文字史的奇观, 在中华文明史上书写了非凡瑰丽的篇章。

一、清代玺印概况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 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噶盖仿照蒙古字创制“国书”无圈点字, 此即后来所谓之“老满文”。33 年后的天聪六年(1632)正月^[1](一说三月^{[2][3]}), 在皇太极的指示下, 达海、库尔禅在老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正字正音的改革工作,^①这种以加圈点为主要特征的文字后来被称为“新满文”, 即有清一代通行之满文。满文篆字创始于何时, 清代历史文献付诸阙如。根据笔者目前所见满文篆字印文资料, 其最早者为太宗时代的“”^[4](满文楷书作  han i boo baj^②) 汉义为“汗之宝”, 或别译“皇帝之宝”。见图 1), 该玺篆字与六部等印篆字一样皆为新满文, 而汗宝之行用在时间上绝然不会晚于臣属印之颁用, 由此可推知满文篆字创制的时间当在天聪六年正月十七日

收稿日期: 2008- 08- 07

作者简介: 黄锡惠(1944-), 男(满族), 哈尔滨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满语语音、满语地名、满文、满汉语言关系研究。

① 在完善满文的工作中, 只提达海一人是不正确的, 至少是不全面的。《吉林通志·库尔禅传》载:“初, 库尔禅与达海齐名, 赐号巴克什, 司国史记注。又与达海详定国书……增为十二字头……与达海遵太宗旨, 寻绎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音未全者, 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 犹不能尽叶者, 则以两字连写, 切成切音, 特精当。国书由是益备。而库尔禅又以汉人书籍教授学者, 为开国儒宗。”(卷 91 5 页)可见, 满文的改进与其创制一样都是集体智慧的成果。作为精通满汉文化的一代大儒, 库尔禅始终与达海比肩协力完成满文的改进工作, 其功于史不可湮没。

② 为便于引用, 本文于满文后对列应出国际通用的罗马转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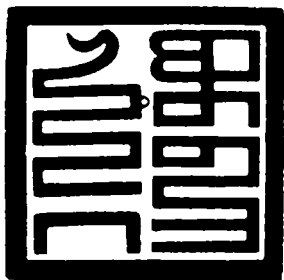


图1 汗之宝
青玉，方三寸九分，
厚一寸，
交龙纽高二寸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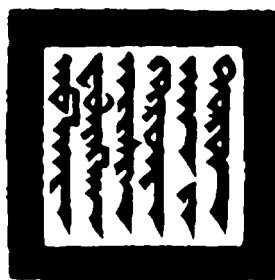


图2 天命金国汗之印
方1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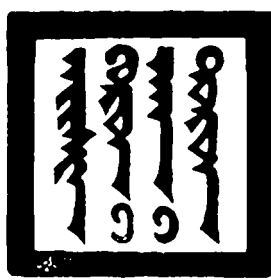


图3 金国汗之印
方12.1厘米



图4 宣差规措所印
宽7.75厘米，
高7.5厘米

(或三月初一日)至八月初八日这半年左右的期间内。^①

篆字是自陶文、甲骨文以来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奠定了后来方块汉字的基础。自古以来，篆字不仅作为信息符号记录了有关我国古代社会早期历史极其珍贵而丰富的信息资料，而且作为权利地位的表征及个人声誉诚信的证物——玺印的用字，成为古代玺印的当然首选，也由此产生了我国传统艺术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篆刻，即以篆字刻印。追溯起来，我国玺印历史悠久，安阳出土的三枚铜玺作为早期雏形，说明远在商代，即已出现玺印。^[5]秦以前官私印皆称“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6]秦代皇帝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各司其用，后又增加当朝丞相李斯所书、咸阳著名玉工孙寿所刻，以瑰宝和氏璧玉为质的“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玺——此即史称之传国玺。六玺加传国玺之制历代因之，其间或有增益，形成官方制度，延续近两千年之久。^{[7][8]}

满文篆字之创制是为了玺印的需要。太祖开后金用印之先河，最初因袭汉制制汗玺，为了适应地方政权统治对象乃关外之满族主体，故所用之字非为汉文而系新创未久的老满文。入关前最早的满文印见诸信牌上的老满文 $\text{ᡆᡵᡠ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abkai fulin ᡆᡵᡠ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aisin $\text{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runi han i doron, (“天命金国汗之印”，见图 2 业经笔者整理)^{②[9]268}及印牌上的 $\text{ᡆᡵᡠ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aisin $\text{ᡆᡵᡠ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run i han i doron (“金国汗之印”。见图 3)，^{③[9]267}观其文字，皆回鹘蒙古文风格之老满文楷书，字体与通用用字（“印”而非“宝”）都同政权初建的朴素意识相吻合。清太宗继位之后，易满文楷书而为满文篆字，而且通名改 ᡶᡠᡵᡳᡨᡳ （“印”）为 ᡶᡠᡵᡳᡨᡳ （“宝”，音“宝拜”，乃汉语“宝贝”之音译），则是向汉族玺印制度传统进一步靠近的必然结果，今天遗留下来之确切为太宗时代的玺印钤本悉为纯满文篆字更充分证明这一点（后金时代早期满文篆字的应用研究，笔者将另文布露，于此不赘）。

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后，为了应对对汉族的统治，玺印一改关外时代的纯民族文而为满汉字合璧形式，正式形成我国官印民族文与汉文的合璧制度——此前虽然也有民族文字与汉字的合璧形式的官印，例如元代的“ $\text{ᡆᡵᡠ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ᡶᡠᡵᡳᡨᡳ}$ 宣差规措所印”（见图 4），^[10]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里的回鹘式蒙古文仅是汉字的对应标音，并非同样意义的蒙古民族语言之意译，与后来清代民族语与汉语在文字上的合璧形式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在元朝这也仅属个别现象，远没有上升到制度化

① 《清太宗实录》载：“天聪六年八月癸酉，工部大臣以六部衙门工竣，奏闻，上亲往视……又命六部诸贝勒于初入署时，率本部大臣赴关领印；各部事宜，皆用印以行……于是颁六部银印各一。”（卷 12 页 170 上一下）

② 钤有这方汗印的信牌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藏沈阳故宫博物院。

③ 钤有这方汗印的印牌现为国家一级文物，亦藏沈阳故宫博物院。



图5 皇帝吉祥之宝
方12.7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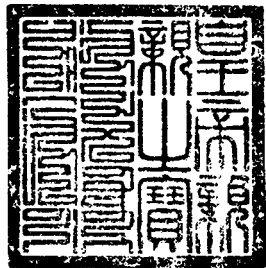


图6 皇帝亲亲之宝
白玉，方二寸二分，
厚一寸一分，
交龙纽高一寸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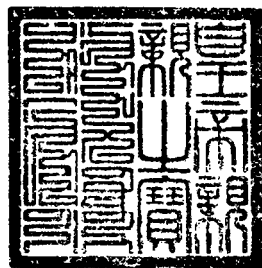


图7 皇帝亲亲之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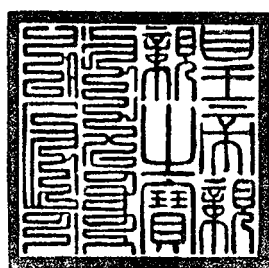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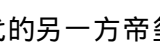


图8 皇帝亲亲之宝

的层面；元代的另一方帝玺“ 𑖅𑖅 𑖅𑖅 𑖅𑖅 𑖅𑖅 𑖅𑖅 𑖅𑖅 𑖅𑖅 𑖅𑖅”（见图 5），^[11]系由八思巴文“皇帝”、梵文“吉祥”或“隆盛”一译“愿吉祥”、^①汉文“之宝”三种文字混合组成，^[12]还算不上合璧形式——，只不过由于汉文沿袭了明代玺印中传统的玉箸篆、九叠篆、柳叶篆书等，而满文则用的是楷书，在合璧字体上显得不够统一、谐调，这种局面直至后来的乾隆时代才得以改观。满文篆字完善、详备于文治武功皆堪称鼎盛的乾隆时代。乾隆十三年（1748），在高宗的直接参与指授下，不惟推进了满文篆字的完成，而且借鉴汉族古文字文化成果，参仿汉文篆书三十二体相应制成了满文篆书三十二体，从而形成了清代满文篆字丰姿多彩的绚烂局面，凸起中国文字发展史的又一兀峰。

有清一代满文篆字主要应用于玺印和碑额（关于清代碑额满文篆字应用研究，笔者将另有专文），尤其是玺印方面。从皇帝到后妃、太子、诸王、藩国、内外文武大臣、宗教领袖等，皆分等级别尊卑，次第以同体满汉文玉箸篆、芝英篆、尚方大篆（即九叠篆）、尚方小篆（即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柳叶篆、彘篆、悬针篆、转宿篆等十种合璧入印，从而既弥补了顺治以来合璧满汉文书体不谐的美中不足，又创造了中国玺印制度史上官印篆体种类应用最多的记录。

民族文字进入玺印与汉字合璧并成为一种制度，是满族的独特发明创造，是满汉文化交流融合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特点。

二、玺印满文篆字失误析正

满文是以“牙”为基础笔画的，字母的区别主要在于牙的多少与圈点及字辨等附加成分有无与位置变化。因此，书写中要严格按照拼写法的规范进行，否则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信息的错乱歧误。由于满文篆书是严格按照满文楷书形体对应创制的，只是为了字体的方正进行了个别字形的调整变化，拼写中词线右移兼其开放式词线位置变化频仍，形成一整套繁杂的拼写方法，并且不同字体篆字除了体形态标识的差异之外，在拼写方法的处理上也不尽雷同，因此比之满文楷书无疑要复杂冗繁得多，对只懂满文而不识满文篆字者来说不啻“天书”。即便在清代，真正熟知满文篆字者也非多多，故而满文篆字这一新生事物在应用中避免不了拼写错误或异体相混之处。

从乾隆十三年至宣统逊位，满文篆字于清代合璧玺印中通用长达 174 年之久，迟至宣统二年（1910）九月满汉文篆字合璧官印仍在铸制颁发，个别地方的印信甚至在民国初年仍在用，民国 11 年仍有皇贵太妃宝钺制事。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篆稿、审稿人的篆法不娴熟或偶然失误，制模、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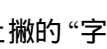










① 这方帝玺八思巴文与梵文的译释，见照那斯图先生《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载《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及《蒙元时期宫廷文书的印章文字》，载《民族语文》1997年第 3期。

造时恐怕也有走样的时候,此外完工后的稽核把关者疏于职守亦难辞其咎),其中的失误每每可见,乾隆时代即已现端倪,以降诸帝亦步其踪迹,尤以光绪朝为烈。清代玺印满文篆字失误常见者有以下情况。











(一)实用玺印

1. 字母错位




玺印中,与皇帝的“天子”地位相应,在行使权力中作为信物的御宝规格最高,也最为神圣。即便如此,帝、后、妃一级玺宝舛误仍在所难免。

乾隆十一年厘正交泰殿藏宝时,将三十九宝钦定为二十五宝,作为传国之玺,另将“其文或复见及国初行用者为数凡十”赉送祖宗发祥地盛京尊藏,即“盛京十宝”。二十五宝中后二十一宝则于乾隆十三年将满文楷字改制成与汉文同体的玉箸篆字。在改制后的合璧篆字宝玺中,有一方“皇帝亲亲之宝”^[4](见图 6)存在着明显的满文拼写失误,从其问世积今 260 年尚无人发现指出。在这方御玺中,动词“亲” n iyan alara^①的  -la 音节之  -i 辅音被错归于其下的  -a 元音上,即  上撇的“字辨”下移一位,使这个词变成满文中所没有的  n iyan an la, 造成了满文拼写法中所不允许的  -n l- 三辅音并列的形式。此宝的正确拼写当如笔者所复原的图 7。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民国 21 年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清代宝玺》明信片,该印的摹写修正本(?)更增添了新的错误,即将属格助词 [i 之左下垂折笔和下面  n iyan an 词中的首辅音  -i 的以及其下与横笔断开的 [i 元音左下垂折笔、[y 辅音的上折笔统统连为一体,底部并与词尾  -n 的底画相连,同时尾辅音  -n 的回卷末笔顶端上折与上画连在一起,使这个字变得更加面目皆非(见图 8)。^{[13]戊 8}

2 衍讹

在“端康皇贵太妃之宝”^{[13]戊 90}(见图 9 宣统逊位后的民国 11 年十一月初十日制^②)中,“端” tab 于元音  -a 下增牙而成为  tan h 这个词在满语文中是不存在的。“太妃” tai fei 这个词的首音节  tai 之  -a 下增牙而成为满文拼写法中所不允许的  ta' ai 形式,从而将此字写成  ta' aifei 对比“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之宝”^{[13]戊 80}(见图 10 道光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制^{③[14]})“太后”之首字,可以清楚看出这一失误。此二词都是  ta 在作为首辅音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可以分析出系篆写者不熟悉满文  ta 之变形写法,由于不明其下的“牙”已经过变形手法折移至右方且牙尖改朝向上(其篆字来源请参见笔者《满文小篆研究(上)》^[5]第二部分“字母形态结构分析”第四点“形体变化”),以致于拼写时为了表现“出牙”而衍讹。

3 脱讹

《故宫信片第五集·清代宝玺》中所收“丽妃之印”^{[13]戊 98}(见图 11 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制^{[16]卷 187 页 1098 下 - 1099 下}),印中“丽” yan an 之第二音节字辅音 -s 作为 19 号辅音下的牙结构字母,被当作曲线结构字母处理而丢掉了上部的牙,写成  yan an, 对比同集内“丽皇贵妃之宝”^{[13]戊 89}(见图 12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制^[17])的同一字书作  yan an, 后者的 -s 才是正确的

① 本文列举的规范满文篆字悉以乾隆十三年刊行的《御制盛京赋》相应篆体为准。

② 关于端康皇贵太妃晋封之时间,《清史稿》没有具体记载,《后妃传》仅言:“端康皇贵妃……宣统初尊为兼祧皇考瑾贵妃,逊位后进尊封。”(卷 214《二十五史》本第 9774 页)这里依据溥仪《我的前半生》“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晋封四个太妃”(群众出版社,1964 年版,第 133 页)的记载。

③ 自此以下玺宝制作日期,率以封、谥仪式所上册宝时间为准。



图9 端康
皇贵太妃之宝
金，方三寸八分，
厚一寸一分，
蹲龙纽高二寸五分



图10 恭慈康豫
安成皇太后之宝
青玉，方四寸二分，
厚一寸八分，
交龙纽高二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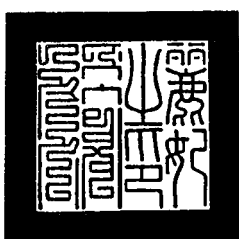


图11 丽妃之印
金，方三寸五分，
厚一寸，
龟纽高二寸四分



图12 丽
皇贵妃之宝
金，方三寸七分，
厚一寸，
蹲龙纽高二寸七分

拼写。

4 讹形

图 9“端康皇贵太妃之宝”中，其第二个词“康” nelhe 尾音节的辅音没有按照变形法规范书写，而写成首笔向下折垂如词首的 [ɳ] 或词中的 [ɳ-i]，使 h 变成了 ɳ ，且曲线结构下的尾元音 e 的写法完全脱离了满文篆字的规范成为三十二体满文篆字篆法中所没有的 ll ，辅音的圈也回收而没有齐底，同时首音节没有按照满文篆字诸体开放起笔上覆的规范拼写要求将附加结构的点与上伸结构的拉辨覆之于开放起笔之下，而是将点、辨与开放起笔并列成平顶式，从而将这个字写成了 nelhe 。第三个词“皇” han 被写成 han ，首辅音顶端中间未断，尾复辅音的最后一个字母也被写成诸体满文篆字所无者。

5 混体

上举“端康皇贵太妃之宝”还存在着严重的字体混乱情况。例如 nelhe 没有按照玉箸篆的左开放式收笔要求写成下垂的末笔，而是篆为收敛型小篆的上包式； han 首辅音的附加圈在玉箸篆体中应写成齐底式且下面要出头，而印中却被书作不出头的词中形且拦腰斩断，一如小篆体。

(二) 谥宝

清代帝后去世后，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一依汉例颁有谥宝，帝后谥宝的规格也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在清代的谥宝中，满文篆字拼写错误也时有所见。

1 讹形

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方嘉庆谥宝“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之宝”^[18]（见图 13，道光三十年五月初一日制^{[16]卷9页160上-下}），其中所有的 a 或 d 统统被写成上部出头的阴性辅音 a 或 d ，如“猷” doro 被写成 duro ，“绥” toktobuha 被写成 tuktohuha ，“端” tob 写成 tuh ，“英” dacun 写成 dean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雍正谥宝“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之宝”中也有这种情况出现，^{[19]282}见图 14，嘉庆四年三月初八日制^{[19]卷40页478上}）。

2 生造

上举仁宗谥宝在曲线结构辅音与 y 音相拼合的变形音节字中，有些地方的处理根本不合篆法。

如“经” anbuha 其于宝中写成 anbuha ， a 与 h 拼合后的折移词线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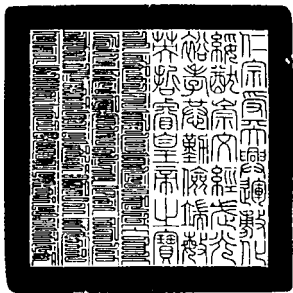


图13 仁宗睿皇帝之宝

玉，长12.6厘米，
宽12.7厘米，
交龙纽，通高11.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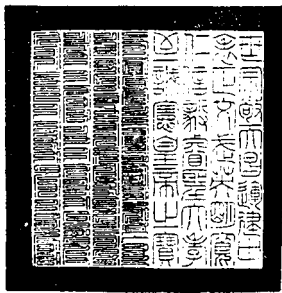


图14 世宗宪皇帝之宝

青玉，长3.7厘米，
宽13.8厘米，
蹲龙纽，通高15厘米



图15 仁宗睿皇帝之宝

碧玉，长12.8厘米，
宽12.8厘米，
交龙纽，通高11.5厘米



图17 顺天府南路
刑钱补盗司知之关防

铜，长二寸八分，
宽一寸九分，
直纽

了，径直在辅音方化的右弧线下以短线连接下面音节字的辅音-m，而且将-i的下折垂线包含至底，右面并列的附加成分也毫无必要地变成了包含式；“裕” [i]n[ɛ]n [i]n[ɛ]n e- [i]n[ɛ]n 的情况也是如此，写成 [i]n[ɛ]n ，- [i]n[ɛ]n 与-y间的折移词线消失，连如前直书的短线也丢弃了，其下失去联系的-yen俨然成为被包含的独立的词 yen而非为原来词的组成部分了；“敏” [i]n[ɛ]n [i]n[ɛ]n u h isu 同样，h下未经词线折移而直接以短线与下面音节-s辅音的上“牙”连接起来，写成 [i]n[ɛ]n ；“睿” [i]n[ɛ]n [i]n[ɛ]n sun- [i]n[ɛ]n 的-i与-y之间当断未断，-n [i]n[ɛ]n 的- [i]n[ɛ]n 应以挪让法回缩并使其下音节- [i]n[ɛ]n 的附加点上伸占位，且与其上、下相邻的附加成分并列，而宝中只包含了下面的- [i]n[ɛ]n 却将上面的- [i]n[ɛ]n 非之于外，并对其下的-ye进行复包含，写成 [i]n[ɛ]n 。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方同样内容的谥宝中除了 t或 d没有犯同样的错误，e- [i]n[ɛ]n 不合篆法的短线未残缺以及 sun- [i]n[ɛ]n 中-i与-y相连的笔画断开之外，其他地方依然没能避免上述失误^{[9]288}（见图 15）。①

(三) 普通官印

类似这样的拼写失误与篆体混淆的情况在高等级的玺宝中尚且不免，一般官印中更可想而知。

1. 错位

清乾隆二十三年六月铸造颁用的“阿兴土千户印”^[20]（见图 16），其中满文悬针篆“部族”

[i]n[ɛ]n [i]n[ɛ]n aman 尾音节首辅音-m的麻辫被错位提升到元音后接-i的两个长牙之间，写成 [i]n[ɛ]n [i]n[ɛ]n a i(m) ka 麻辫既无牙可附丽，-i又被一分为二。

① 清乾隆以前，帝后升祔太庙的尊谥玉册、玉宝仅藏一份于京师。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命重修盛京天坛、地坛，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清高宗实录》卷 1065，页 248上）。四十五年六月，以原有册宝次第铸造，其玉质、大小长短不能一律，特命有司俱以和阗良玉敬造列朝宝册，一律从同，以奉太庙，并将京师太庙换出者恭送盛京太庙尊藏。规定“嗣后凡有举行宝册事，皆以是为例，必为二份，一奉太庙，一送盛京”（《清高宗实录》卷 1109，页 833下）。迨降诸帝皆依制将先帝、后尊谥册宝另制复本恭送盛京太庙。《清宣宗实录》有这样的记载：“礼部奏准：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升祔太庙，恭进玉册、玉宝，请旨另造一份，恭送盛京太庙尊藏。又加上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后、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尊谥册宝，亦应于盛京太庙各恭进一份。其玉册由京重造，玉宝照例在盛京敬谨改铸。所有原奉玉册五份，请派往之王大臣恭请回京，尊藏太庙。”（卷 9，页 187上一下）《辽海印信图录》登载了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除宣宗成皇帝外自太祖至穆宗九朝帝后谥宝 29方，其字体较原本粗犷，说明并非原样拷贝，而是有意区别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当后代皇帝加谥时，其谥宝是在盛京用原有的旧宝改铸，这与玉册从京城做好将旧册换回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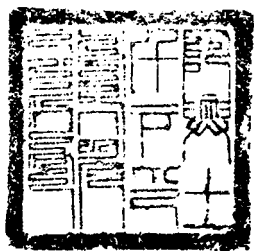


图16 阿兴

土千户印

铜，方7.4厘米，
厚1.8厘米，
柱状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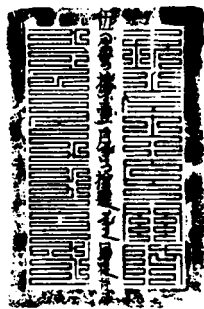


图18 钦差

大臣关防

铜，长三寸二分，
宽二寸，
直纽



图19 镇守

盛京等处将军印

银，方三寸三分，
厚九分，
虎纽二台



图20 管理三姓

地方兵丁副都统印

银，方三寸二分，
厚八分，
虎纽二台

2 衍讹

清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铸制的“顺天府南路刑钱捕盗同知之关防”^[21](见图17)中，“路”

ᠯᠤᠯᠤᠯ ᠰᠠᠨᠠᠯᠤ ᠵᠢᠨᠠᠨ 的尾音节辅音多牙而被篆作 ᠯᠤᠯᠤᠯ ᠰᠠᠨᠠᠯᠤ ᠵᠢᠨᠠᠨ 而且垂露篆独立的属格助词 [ᠨ] 都如玉箸篆体出头作 [。

3 讹形

清咸丰五年(1855)钤印的“钦差大臣关防”^[22](见图18)中，尚方大篆体“差”

ᠰᠠᠨᠠᠯᠤ ᠵᠢᠨᠠᠨ tak raha 的第二音节元音 [ᠠ] - 上部封闭结构的字肚 [ᠠ] - 右边的封闭被打开，变成了 [ᠠ] - a，使这个音节变成了 -ka' i (如果是 -a i，则 -a 后面的 -i 应当是双长牙 ᠠ，而印中现在这个样子却什么也不是)，从而将此词篆成 ᠰᠠᠨᠠᠯᠤ ᠵᠢᠨᠠᠨ。

4 混体

上举“钦差大臣关防”中“差”的尾音节 -ha 没有写成尚方大篆的 ᠠᠨᠬᠠ，反而将圈上行占位写成 ᠠᠨᠬᠠ，

尾元音 -a 右长撇的上卷不见了而成为小篆体。“大臣” ᠠᠳᠤᠨᠪᠠᠨ ᠠᠨᠪᠠᠨ ᠠᠨᠪᠠᠨ 写成 ᠠᠳᠤᠨᠪᠠᠨ、“关防” ᠵᠢᠨᠠᠨ ᠵᠢᠨᠠᠨ ᠵᠢᠨᠠᠨ 写成 ᠵᠢᠨᠠᠨ，它们的右长撇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一般说来，乾隆时代因为是满文篆字完善兴起时期，弘历皇帝具有较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对汉族传统书法艺术有较多研究，对满文篆字极为关注，是以亲自领导参与了满文篆字的改革完善工作，兼之盛世人才荟萃，所以满文篆字完备之业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辉煌成功，并迅速将之全面应用于玺印之中。内阁大学士撰写的印稿要事先上呈皇帝御览训定后方交礼部如式镌铸，所以这个时期尽管因全国上下万方官印的满文楷字都要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赶制改成篆字而创造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体式最丰、历时最长的制印“吉尼斯”记录，但在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还不是很多，主要表现于个别字体的混淆方面。例如乾隆二十二年钤用之柳叶篆“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印”^[22](见图19)，独立的格助词 [ᠨ] 及结尾的 [ᠨ] - i 与曲线结构辅音 [ᠨ] - 相拼成的 [ᠨ] - 分别写作 [ᠨ] 及 [ᠨ]，为钟鼎篆法之阑入(柳叶篆的写法应当是 [ᠨ] 及 [ᠨ])，在三十三年的“管理三姓地方兵丁副都统印”^[22](见图20)中则黏接在词后成为词尾形者正确，而独立的仍皆为钟鼎篆体，这样混体的错误直到五十三年年的钤本中才见更正过来，但在 [ᠨ] - d 的写法上却并非柳叶篆，还是受到了小篆的影响(见图21)。^[22]

在笔者收集的部分乾隆时代官印中，属于这类混体的情况还有一些，兹不具述。



图21 镇守

盛京等处将军印
银，方三寸三分
厚九分，
虎纽二台



图22 山东巡

抚兼提督銜关防
银，长三寸二分，
宽二寸，
直纽



图23 安徽巡

抚兼提督銜关防
银，长三寸二分，
宽二寸，
直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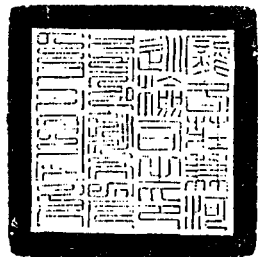


图24 庞各庄

兼河巡检司之印
铜，方一寸九分，
厚四分，
直纽

5 缺文

在满文篆字兴盛的乾隆时期，除了玺印中单词内部的拼写失误，还出现了印文中句子成分残缺的问题，即在一方印内，满汉文不能全部对译，一般是满文丢失了部分信息。例如：

乾隆四十九年钤印的小篆体“山东巡抚兼提督銜关防”^[22]（见图 22）中，满文只写成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shandun ■ ni ■ yarime dasara amban i kadalan, 译成汉语为“山东巡抚关防”，其中“兼提督銜”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bime fideme kadalara amban i jei ■ kam ciha 这样的内容于满文全然不见。对比同治五年（1866年）钤印的“安徽巡抚兼提督銜关防”^[22]（见图 23），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后者的“徽”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h 篆作 𐩺𐩠𐩨𐩠，辅音 h 下部的牙被错写成封闭的 -o 且同下面的元音 -i 之间缺乏连接词线而中断；“巡抚”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yarime dasara amban 合成词组的第二个字 dasara 中的首辅音 d- 因为出头而变成阴性，使 da- 变成了 de-，从而把这个字拼写成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desara。

这类的失误在清乾隆以后的岁月中仍有发生，如道光十八年（1888）十二月所铸垂露篆体“庞各庄兼河巡检司之印”^[21]（见图 24）满文篆字印文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pan ■ juwan ■ ni bira kam e ha ■ yarim si i doron 中，脱“司” 𐩺𐩠𐩨𐩠 sy——此可以对比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石港口巡检司之印”^[21]（见图 25）。此印正确者当为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 𐩺𐩠𐩨𐩠。此外，该印之“巡检”于尾音节辅音 -s 的顶部缺牙，错写成 𐩺𐩠𐩨𐩠，其正确篆法乃为 𐩺𐩠𐩨𐩠。

随着以后汉文化影响的加深，满语文的应用逐渐衰退，其应用中的问题也日渐多了起来。到了面临没落的光绪时代，由于时局动荡、国运多舛，许多事务未能走上正规，使得本来就极少有人认识的满文篆字之学习应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比及光绪中后期，开始出现纯汉文的官印，合璧官印满文篆字的篆法也不甚规范，讹误迭出，后期字体的混用错乱更趋严重。比较起来，虽然乾隆以降各朝官印的满文篆字在拼写中生造、讹形、错位、脱衍、混体甚至缺文等谬误都不乏见，但是光绪时代满文篆字应用中的舛误最多，仅笔者收集的有限钤本资料中就多达几十方，这里无法一一胪列，只选取有代表性者举析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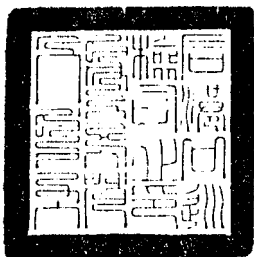


图 25 石港口
巡检司之印
铜,方一寸九分,
厚四分,
直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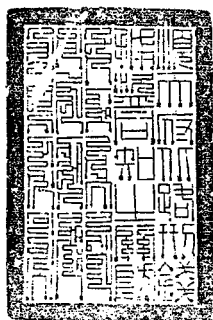





















图 26 顺天府北路刑
钱捕盗同知之关防
铜,长 9 厘米,
宽 6 厘米,
直纽























图 27 办理奉天
全省文报事务关防
铜,长 9.2 厘米,
宽 6.1 厘米,
直纽

清光绪三十年(1908)四月“顺天府北路刑钱捕盗同知之关防”^[23](见图 26),垂露篆“钱”
ᠠᠯᠢᠶᠠᠨ caliyān 尾音节脱 -n 而被篆为 ᠠᠯᠢᠶᠠᠨ caliya “关防”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kadaḷan 尾音节
辅音 ʃ 上伸附加笔划“拉辮”被错归于中音节 ʃ 而写成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kadka。此外,印中所有的非词
尾形附加“圈”统统都写作底部出头者,这在满文篆字中是没有先例的,属于生造,殊不足取;格助词 出
头皆如玉箸篆。

最严重者莫过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启用的“办理奉天全省文报事务关防”^{[9] 395}(见图 27),印内所
用 ᠠᠪᠠᠢ ᠨᠢᠶᠠᠨ ᠪᠡᠢ ᠬᠢ ᠨᠢᠶᠠᠨ 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ᠠᠭᠠᠨ ᠠᠯᠠᠨ ᠠᠭᠠᠨ abkai in iyan ᠪᠡᠢ bci ᠪᠡᠢ loi bi the i
boolara baita be i h i yara kadaḷan 全部十个垂露篆风格(因为在该印中,尽管从字的结体上看属于垂露
篆,但所有垂笔应当缀有体标识者都失落露珠)的满文词,无一篆写正确。其中,“天(的)”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的
音节丢失 -k 的两个牙而写成 ᠠᠭᠠᠨ aba; “奉”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的写法更离谱了:首音节 ʃ 多出个似牙又似玉
箸篆 -t 的东西,使这个音节变得无法识别;第二三音节 -m iyan 首辅音 -m 的麻辮被错移到牙下,其下面
的 -i 被去掉了下垂的折笔反移至于牙上,下面的 -y 被写成尚方大篆体的 -e, 而其下的 -an 更是面目皆
非: -a 下面的 -n 牙丢掉了, 却被写成了词尾形的 -i; 尾音节 - 也很特别, 19 号辅音下的牙结构本来
应该省却上开放词线直接与 - 的横折末笔的连接点相接出牙, 而印中却以曲线结构与 -i 相拼情况下词
线折移的形式从靠近左边线的左 2 线下来折移至右 2 线, 再向左出二牙, 结果少了一牙, 整个词写成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全” ᠠᠭᠠᠨ 首音节 ᠠ 的下开放词线不是从下部距右边线 2 间远处的右 1 线伸出, 而是从 1
间远的右 2 线向边线斜下撇出, 这样一来, 与音节末的收声辅音 -b 就无法正常相接, 此一误; 紧接着下
面又多出一个牙来, 使首音节变成了 ᠠᠪᠠ; 此二误; 尾音节的辅音 -e 被错写成 -j, 应当回收从右 2 线与
尾元音直接连接的词线却毫无道理地进行左折移从距左边线 1 间远的左 2 线实现衔接, 此三误——以
此将该字拼写成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省(的)”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问题出在尾音节, 于 -o 元音下本应该直接以下开放词线与黏
合的格助词 相接, 而印中却画蛇添足增出一个牙, 使尾音节变成了 -bn' i; 从而把这个字写成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文(的)”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于印中写作 ᠠᠭᠠᠨᠠᠯᠠᠨ, 首音节 b 下衍出一牙, 变成 ba' i; 尾音节 -h 作为曲线结构辅音,
首笔应当另起成开放式, 而斯印未如是, 乃竟然于闭音节辅音 -t 之末笔上不加词线直接联结, 造成 -t 后
面的牙与 -h 的混同, 使人茫然如置身于十里云雾之中, 难于识辨, 更加之元音 -e 的牙残缺了, 牙的下角
没有右折的回笔而变成与词尾形元音 -i 在左 2 线相接的词线, 而其下于右 2 线出向左折移词线(与

的情况类似),复接词尾黏合格助词;“报”在印中书作,首音节复元音中后面的-o被移到下个音节中去,而将中音节-l的牙置换到这里,使 boo变成了 bon;这样一来,影响到中音节,-la成了无牙的-l与-on的组合;尾音节的辅音-r因折笔处少了向上的短笔而变成了-i,元音-a的下面衍出了一个玉箸篆体词尾形的-r使-ra变成了-in;“事务”在印中写作,首音节 bai中-a元音后面的-i根据拼写法应该是两个长牙-i,后面的一个与中的情况一样,被去掉了向下的垂笔,其下面多出了一个牙,变成了 bai;尾音节-ta后面也增出一个牙,成了-tan。“把”写成,格助词 be少点多牙变成了 ba'a。“办理”在印中被写成,首音节字冠下增牙,i的后面增-i,变成 ai;第二个音节-ci(由于印样不甚清晰,印中原文似为,根据前面中-c的写法,笔者将其复原为,似乎还可以复原为,成为尚方大篆体的写法,但这样一来就与本字下面的以及前边已出现的同一形式-iyā中-y的写法混同了,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前者)的辅音,错写成-j;下面元音-i被移位至其上(也可以把上面的-i视为衍出,而下面-i的垂笔打了弯,其下开放性词线不见,类乎被处理成曲线结构辅音与-i相拼的模式移到前面去了)。第三四音节-hiya作为曲线结构辅音首笔所犯的错误的,一似,但这里已不是曲线结构辅音-h与-i相拼的省略变形,而是一上一下多出两个牙成为-he' n的形式了;下面的-y如前所见被篆作尚方大篆体的-c,而-a脱落。尾音节的辅音-r因折笔处少了向上的短笔而变成了-i,元音-a与辅音脱离,且下面衍出了一个玉箸篆体词尾形的-r情况与前面的几乎完全一样。“关防”是普通印信中常见的一个通名,按说不应该出错了,但也还是被蹩脚地篆成,首音节 ka-被增点写成;中音节因尾音节的拉辮错位升高以及缺点而使-da书成-(l)ta;尾音节因中音节下的-l辅音拉辮的错位,剩下了三个牙,-lan变成了-ka。综观此个案十篆十错的典型,足以说明满文篆字应用之生造、讹形、脱衍、错位、混体等混乱现象于光绪末年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极个别官印中满文篆字俨然成为形同虚设的装饰点缀,完全丧失了传达信息的功能。

虽然如此,清代普通官印多达上万方,满文篆字偶有失误不足为奇。而皇帝传用之国宝重器毕竟只有二十一方(清代传用御玺共二十五方,其中有四方系太宗以来“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而非乾隆时代改铸具有合璧满汉玉箸篆字者),如此高规格的有限御宝之中也出现满文篆字拼写法上的失误,就不能不是一桩大失皇家脸面与政体尊严的严重事件了。令人费解的是,这方拼写错误的“皇帝亲亲之宝”竟然能够得以蒙混过关,在“以展宗盟”的诏书上堂而皇之地钤印面世,诚可谓玺印史上罕见之一大奇观。

此外,还有一方梅檀香木质的“ [ ( han i boobai) 皇帝之宝”^[24](见图28),“皇帝”满文之玉箸篆应当写作,印中却书成,收声辅音-n的尾部本来应当写作收敛型的,却被书成开放型的。在满文篆字三十二体中,属于开放型篆字的-n虽然尾部垂直折下,但转折点却是在右边线上,例如悬针篆的 aim an中写作、垂露篆的 kadalan中书成等。除此之外,尚无似此形式从中下垂者,只是坟书因尾部要向外斜出而推动折点内收,从而写成,如 ilan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尾部的斜画造成的,况且其在同样的情况下附加成分圈与主体笔画尾部不同此印作并列式而作下承式——圈不下垂至底而为主体笔画尾部所承托,即如 han。因此,这个字不属于异体阑入之混体,亦应判为讹误。分析所以如此,合乎道理的解释只能是:玺中将字尾写成与下面属格助词连写的形式(由于连写,词尾形的势必由封闭式改而为开放式,而词尾形的-i书作,上开放性词线位于右2线,以故推动其上已变成词中形之的下开放性词线内移至右2线成为以便与同线相接,从而成为玺中现在的样子。类似的例子如“天之”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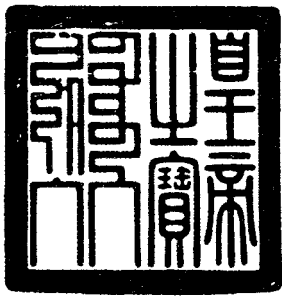


图 28 皇帝之宝
梅檀香木,方四寸八分,
厚一寸七分,
盘龙纽高三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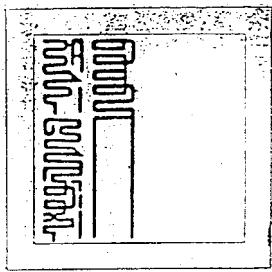


图 29 制诰之宝印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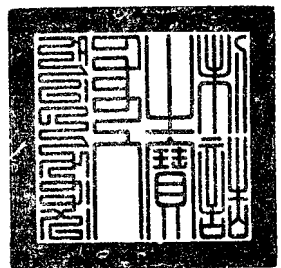

















图 30 制诰之宝
青玉,方四寸,
厚一寸九分,
交龙纽高二寸七分

便如此,例中的 [ɿ] 虽然系以 -a 结尾,但在满文中词尾乃至词中闭音节收声辅音 -n 及 -n 与 -a 及 -a 的书写形式是完全相同的),但由于收声尾辅音后面的属格助词不能像在元音后面那样可以黏合(前举“天命金国汗之印”老满文               

员自居,亦不得心存推委,遇事知而不言,致干重戾。所有承办奏折之主事德宁、缮写之笔帖式兴保,俱著交刑部治罪。”

又谕:“阿明阿因内务府奏折错误,已降旨革去内务府大臣,但念伊向来不识清文,管理内务府未久,诸事本未谙练。著加恩赏给头等侍卫,仍戴花翎,随同永来学习管理圆明园事务。朕非因阿明阿系藩邸随侍之人,同罪异罚也。”^{[19]卷19页609F-610上}

甲申,又谕:“三法司奏将内务府呈递奏折书写错误之主事德宁,笔帖式积善、兴保按律分别定拟一折,此次内务府奏折恭书孝圣宪皇后尊号缮写错误,其罪甚大,该承办之主事、笔帖式等官律以大不敬之条,实属罪无可宽,自应依律办理。惟是朕在藩邸时,向知内务府掌仪司承办祭告典礼,于列后尊号中惟孝贤纯皇后尊号常时敬谨缮写。此次竟系顺笔致误,且内务府人员于清文本不熟习,至如缮写清文,则多有依样描画,不但不解文义,且并不识字面者有之。即汉人中亦有能写不能识者,况此案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已皆分别从轻示德未加深究,则此等微员于万无可宥之中亦不得不求其一线生路,量从末减。所有承办之主事德宁、写底之笔帖式积善,均著加恩免死,各枷号一个月,满日鞭责八十发落。笔帖式兴保,年仅十七,系照本誊缮,或竟不识清字,业经革职。著从宽鞭责五十,即行发落。”^{[19]卷19页616F-617上}

从中可以看出内务府大臣的奏折中,只因孝圣宪皇后尊号满文缮写的一处失误,相关责任人尚要被以“大不敬”罪论处“斩决”,那么作为皇权象征与仪礼重器且时有所用的皇帝传国御玺,其庄重地位与皇后尊号之缮写自然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在皇帝御宝中出现前揭满文篆字拼写失误的问题,无论怎么说也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满族文字及其篆字于有清一代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满族语言濒临灭亡、满族文字成为死文字的今天,对满族文字特别是满文篆字进行全面研究,是满族文化整体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对满文篆字不注意加以研究、清理,那么起码在文字学领域势必还是处于茫然无知、笼统模糊的认识状态中。对此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不闻不问,甚至以为没什么可研究的,则不仅是对满文篆字的无知,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不负责任。

满语作为濒临消失的语言,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记录满语载体之满文及其拼写法的研究,一直是满语文研究的薄弱环节。对于满文篆字,向少问津者,尤乏科学、深入、具体研究之力作。而对于满文篆字在玺印应用中存在问题的研究,更可谓前不见“古人”。因此,本文所揭示出来的满文篆字玺印中之诸多失误,对于具体了解满文篆字在有清一代使用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存在那些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认识价值。

特别说明:本文引用的满文玺印铃本,除笔者到北京、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院(馆)等查阅收集之外,尚得到各地朋友慷慨的馈赠。谨于此对调查研究中给予大力支持、无私帮助的各单位暨各界新老朋友致以诚挚谢忱!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满文老档: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1196
- [2] 图海,等. 清太宗实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11.
- [3] 赵尔巽,等. 清史稿:达海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9815.
- [4] 交泰殿宝谱[K]. 民国18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印行本.
- [5] 王廷洽. 中国印章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8-19.
- [6] 卫宏. 汉旧仪:丛书集成初集天津馆丛书本[M]. 新1版. 北京:中华书局,1985:1.
- [7] 金毅,齐雅香. 不断完善 广泛应用——清代满文篆字应用情况的再调研:上[J]. 满语研究,1999,(2).
- [8] 金毅,张鹏. 不断完善 广泛应用——清代满文篆字应用情况的再调研:下[J]. 满语研究,2000,(2).
- [9] 王绵厚,郭守信. 辽海印信图录[K].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 [10] 朝洛蒙. 蒙文篆刻:蒙文版[M].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10.

- [11]罗振玉. 隋唐以来官印集存 [K]. 民国 5年影印本: 26
- [12]文物编辑委员会. 文物资料丛刊 (1) [G].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7: 70
- [13]故宫信片第五集· 清代宝玺 [K]. 民国 21年故宫博物院印行本.
- [14]文庆, 等. 清宣宗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卷 146
- [15]黄锡惠. 满文小篆研究: 上 [J]. 满语研究, 1998 (2).
- [16]贾桢, 等. 清文宗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7]宝璠, 等. 清穆宗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卷 6
- [18]朱诚如. 清史图典· 嘉庆朝 [K].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 62
- [19]曹振鏞, 等. 清仁宗实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0]夏廷安. 云南永善县发现清土司印 [J]. 文物, 1996 (1).
- [21]黄伯川. 衡斋藏印 [K]. 民国 24年套色影印本.
- [22]官印谱 [K].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
- [23]罗福颐. 古玺印时代鉴别例证 [K]. 故宫博物院复印本.
- [24]徐启宪, 李文善. 明清帝后宝玺 [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96: 93
- [25]明清史料 [G].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责任编辑: 长 山]

On the Errors of Manchu Zhuan Characters in Royal Seals of Qing Dynasty

HU NG Xi-hui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32 styles of Manchu Zhuan Characters provided in the 13th Year of Qianlong, 10 of them were used in the Emperors Seals which initiated a writing system both full of ethnic specialty and rich in number written side by side with Chinese Zhuan characters. The Manchu Zhuan Characters were used up to 174 years in jointed royal seals with Manchu and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seals of emperor and queen to the officials among which there were no lack of such errors as man-made inventing wrong form and so on. The situation first appeared in Qianlong Reign and was traced by the following emperors. It had reached top in Guangxu Reign, especially in his late years, the Manchu Zhuan Characters in several seals had been used merely for show completely losing the function of communicating information.

Key words Royal Seals of Qing Dynasty; Manchu Zhuan Characters; error